

盛唐山随笔 刘鹏程

诗坛那些事儿

一直以来,“文学边缘化”、“诗歌边缘化”的说法屡见不鲜,文学,特别是诗歌,从曾经一个时代的美丽梦想,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。然而,近些年来,无论是在平常,还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背景之下,总会发生一些诗歌事件,引来公众热切关注的目光,给寂寞的文学话题平添了几份热闹,如孔雀开屏的美丽。只是读者和媒体往往更喜欢关注诗歌“不堪”的一面。

从2006年底开始,2007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女诗人赵丽华被网友恶搞事件,当是一大景观。诗人,这个已经很多年不招人待见的词,突然间成了大众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:女诗人赵丽华的一些“废话诗”突然引起了网友的兴趣,他们将之命名为“梨花体”诗歌,并以各种形式模仿恶搞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“梨花事件”逐渐升级演变成一场闹剧。一时间,赵丽华以“诗坛芙蓉”的外号“臭名昭著”,现代诗歌和诗人成为网友热批的对象,似乎一夜之间,每个人都离诗歌那么接近,一伸脚就可以踹上诗歌的腰,甚至每个人都可以用大白话来进入诗歌的世界,于是开始了一场讨伐诗歌的语言狂欢。先是韩寒在博客上“大鸣大放”,声称“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”。韩寒的言论引起许多诗人的强烈反感。以沈浩波为代表的数位诗人在网上与韩寒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口水战”。紧接着,为了声援赵丽华,一些诗人集结起来,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”朗诵会。会上,诗人苏菲菲当众裸体朗诵诗歌,惹来一片哗然。几天后,此次脱衣事件的主角将整个事件过程的照片发布在了自己的博客上。

几乎是在同时,一个网站推出“造诗软件”,只要随便输入几个主题词或者关键词,乃至互不相干的几个词,就可以生成一首读来不知所云之所谓“诗”。至此,“恶搞”事件达到高潮。

很多人都没有想到,被称为“文学娇子”的诗歌,以这样一种悲哀的方式进入大众的关注视野,几乎是遭遇一场灭顶之灾。

从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很多关于诗歌的争论。于是,很多人对诗担忧,为诗“正名”,认为现代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误解。其中,《人民文学》2007年第三期以诗歌专号的形式出版,此前,创刊半个多世纪的《人民文学》仅出版过两次诗歌专号。主编韩作荣说“只是想诗遭到冷遇时为人们的心灵送上一丝温暖,并体现当代新诗发展的本来面目。”同时,《青年文学》也出版诗歌专号。从2007年以后,一些重要文学期刊包括《十月》、《天涯》等,纷纷扩大诗歌版面,一些以前没有诗歌的期刊如《钟山》也增设了诗歌栏目。

2007年发生在诗坛的“包养”事件,也是公众和网络的一大热议。生活窘迫的湖南籍诗人黄辉,通过媒体宣称想被富婆包养,从而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。该言论一经公开,网络上立刻骂声一片,黄辉更是被大众冠以“伪诗人”、“文化贱客”、“流氓作家”等骂名。风口浪尖之时,曾发表长篇小说《商海迷情》的重庆知名女作家、富姐红艳在博客中主动表示,愿意“包养”黄辉一年。此言一出,立即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,“包养”事件再次升级。

当事人富姐红艳对此事引起的激烈争论始料未及,称“已经不敢在网上阅读网友的评论”。与此同时,她向公众澄清,她所指的“包养”,并不是要和黄辉有任何肉体上的交易,本质上就是资助,但她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敏感词语,唤起社会对文化人的关注。后来网络上流传有一份红艳和黄辉的“包养协议”,协议上涉及到一年的包养费12万元。对此,网络上的看法不一,甚至有激进的网友认为,“包养事件”对诗歌的意义远胜于赵丽华的诗。

与“恶搞”和“包养”有所不同,每隔几年都会发生一次的诗人自杀事件。在网络等公众媒体总会引起热议。1987年,女诗人解解用一把精致而锋利的手术刀割断了大腿上的静脉动脉,年仅33岁;1989年3月26日,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,时年25岁;1990年,诗人方向服毒自杀;1994年,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在新西兰

用斧头砍死妻子谢冰,继而在一棵树上吊死;1996年,著名诗人、报告文学作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自杀,时年82岁;2005年,河北诗人周建政在自己35岁生日时自杀身亡;2007年10月4日,诗人、小说家余地在家中自杀身亡,留下患重病的妻子和一对不满百日的双胞胎儿子;今年前不久,广东青年诗人吾同树在自己按揭贷款购买的新居里自缢身亡……这类相对严肃的诗人自杀事件,每一次都会在诗坛引起不小的震动,并且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辐射到公众的视野,引起公众对诗歌和诗人的评价。这些诗人的自杀事件,大多以疼痛的形式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,而海子的自杀,包括海子无限浪漫的诗歌,20年以来,早已演变成一个时代的诗歌神话。

但是,有一些诗歌事件往往和诗歌本身所固有的激情一样,它总是要对社会进行呈现或者承担。八十年代的汪国真诗歌热,虽然诗坛本身并不一律看好,但是汪诗却足足影响了一代青年,给八十年代画上了诗意的一笔。与七十年代的天安门诗抄一样,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,铺天盖地的诗歌,从几乎所有的诗人开始,扩张到普通人,从创作、出版到朗诵活动,迅速承担起了鼓舞人心的担当,显示了诗歌作为“文学娇子”的美丽和青春活力。从诗歌艺术本身而言,从诗歌艺术的发展变化而言,它也在不断地影响着公众的教育。特别是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选编问题,也是从诗歌和诗坛内部开始,话题迅速蔓延到公众层面。九十年代,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毛翰,首先提出中学语文教材上的新诗需要重新选定。此话一出,迅速出现了以四川《星星》诗刊为代表的北方观点和以广东《华夏诗报》为代表的南方观点,既而蔓延到教育学术界和整个社会,经过一番激烈的论争,最后尘埃落定。一批朦胧诗人包括舒婷、梁小斌、江河、海子等的朦胧诗被选入中学教材,为诗歌教育掀开了新的一页,也为诗歌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。

石悦

晚 归

累了一天,下班后本该是回到温馨的小巢,卸下疲惫的时候。可是,一大早,晚上的饭局就由别人安排好了,有时,还是昨天、前天的预约。不去,伤感情。去了,酒杯一碰,没有三、两个时辰,是结束不了的。于是,晚归是避免不了的事。

吃请多了,穿行于各式各样的酒屋、酒屋、酒吧、酒店之间,发现处处宾客满座,日日食客盈门,而且都似一见如故,一往情深;都在一饮一啄,一醉方休;都能高谈阔论,吆三喝四;都会抒豪情、立壮志,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。这个时候,没有人看钟表,没有人惜时间,一不留神就是央视四套的《海峡两岸》了。真的,晚归是相当普遍的事。

起初以为,晚归是迫不得已而为之,是盛情难却而随之。现代化社会需要交际,请人家和被人请都必不可少。不然,酒店饭馆不会越开越多,越开离城市越远。吃请和请吃,也确实情感投资的平台,是交流信息的载体,是互利互惠的产物。后来,听人说“混得差,下班回家”,“混得好,饭局少不了”,才觉得晚归还潜藏着一种人气人缘,甚至是一种身份地位。特别是总是被人家排着队请的人,说明被人尊重、受人拥戴,说明资源丰富、价值连城。对号入座,晚归成了很乐意的事。

晚归经常了,习惯了,不晚归还觉得奇怪了。当今家庭人丁稀少,独生子女,双职工,做饭是件苦差事。而且,从老祖母那里传下来的烹调手艺已经萎缩,随处可见的冷冻食品、方便食品,吃着同快餐店里的食物同样味道时,就产生出对小炒、清蒸、火炖、油煎、热烫、生猛等菜肴的亲密和眷恋。怎么办?出去搓一顿。混得好的,有人请;混得极致的,一般人还请不到;混得一般的,轮流坐庄,互相请;混得不怎么样的,对不起,只能卧在自己的小巢里,萝卜白菜,自取其爱了。不过,时下生活条件好了,观念也在变化,隔三差五的上了馆子、进进酒店的人也越来越多,晚归成了新的一族。

渐渐地,晚归不仅仅因了在外面吃饭,更盛的还是酒足饭饱之后的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。公务员打扑克,小老板搓麻将,谈生意的去咖啡厅、茶楼,激情四射的去歌厅、舞厅,卡拉

OK,高雅一点的去健身房去网球场或保龄球馆,应有尽有。男人天生着不安分的灵魂,对新潮对时尚对高水准的追求,即使不懂,也要用旁人营造的品位来抬高自己的身价,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街小巷的那些特殊的、火爆的、诱惑人的地方,正好满足了男人的这种虚荣。那里都是一种很暧昧很感性的场所,有光影有美食有流动的女人。而这光影这美食这女人总是笼罩在一派柔和昏暗的温情里。这种温情滋润着以往并不多的情愫,也掩饰了许多真实的東西。五音不全的可以在这里信口高歌,五大三粗的也能在这里尽兴扭摆。虽然是才见面的男人女人,甜言蜜语间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,呷一口鲜亮如血的琼浆玉液,酩酊中也有一副相见恨晚、同生共死的样子。要是一直昏沉下去,可以穿穿黑夜,这里没有天亮的时候。

最悲哀的恐怕还是那个花费了那么多时间、精力和金钱装修的一个个精致的巢,却因此怎么看怎么像高级酒店的长期包房。家早已不是那个温馨的家,而对于家庭气氛的怀想,却仿佛只剩下老式电影中的场景。婚姻生活变得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,人们对婚姻的期望不再是“过日子”、“生孩子”,可什么是理想的婚姻却没有人说得清楚。女人喜欢把婚姻当成爱情的花园,男人铁定了把婚姻当成事业的后院。这种两性之间的差异,注定了站在“城”外看风景的人越来越多,导致了心灵和归宿的归属,空虚和失落是迟早的事。音乐安慰过了,书籍抚慰过了,美酒消调过了,山山水水休闲过了,玩过了,乐过了,笑过了,新一轮空虚又如潮水般重新袭来,覆水难收,便无数次地飞蛾扑火,无数次凤凰涅槃,一点脾气没有。

冷静下来,晚归的滋味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痛,是心灵空落的痛,是生活失落的痛,是吃饱喝足后的痛,是无所事事、想入非非的痛。心,一会儿阴一会儿晴,一会儿热一会儿冷,一会儿高一会儿低,一会儿紧一会儿松,那是一种病,哪能不痛呢?痛定思痛,真觉得晚归还是少一点的好。真的推不开应酬,那就酒足饭饱之后立即开回府,即便是万般无奈,万不得已,也要在阳光下远行。

民间词语文

季昌清

“小鸡带老鸡”

从这个题目看,似乎是如我们农家养的老母鸡,孵了一窝小鸡,老鸡带着小鸡到处觅食一样。实际又不一样,而是“小鸡带老鸡”,就是说,是反常规而为之。

问题就在这里,回忆起来,三十年过去了,这种反常规的事情是出在那个反常规的年代,直言之,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。当时看,是股潮流,现在看,不可思议。既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,更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。

是怎么回事呢?二十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,是不知道的,知道了,也是不理解的,4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可能有所知,但不亲身目睹其经历,也是搞不清楚的。

七十年代初期,林彪一伙已经垮台,“四人帮”一伙仍然大权在握。他们为其政治的需要,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,要补充“新鲜血液”,要从工人、农民中选拔一批优秀分子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。鉴于这一政治背景,根据当时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(当然是集体研究的意见),抽调

任树林同志(时任组织部副部长),吴功玉同志(时任干部科副科长)和我做这项“新鲜血液”的摸底考察工作。这项工作,记得搞了好几个月,且都是单线直接向市委书记汇报,然后再交由市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。经过几个月的的工作,也确实从工厂、农村选拔了一批年轻同志参加进了各级领导班子。这些人大都在班子中担任了主要角色,不是什么搞摆谱,做样子,,可以说是实权在握。而班子中的一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,却屈居在次要位置。这样的格局渐渐地在大干部群众的大脑子里,就形成了这样的印象,老的不如小的,小的领导老的,老革命不如新革命,新革命领导老革命。后来有些“有智慧”的人,干脆就来了一个言以蔽之——“小鸡带老鸡”。这就是“小鸡带老鸡”这个词语的出处和由来。诚然,我们的词典、辞海、辞源又多了一个新名词,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件小创造!或许也是对国语言学的一件小贡献,亦或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件小补缺吧!

可是,好景不长,1976年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三大伟人相继过世,

随之“四人帮”因积怨太大、太深,很快也垮台了,灾难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。全党、全国、全军上下一致声讨“四人帮”的滔天罪行,开始彻底清算他们的种种罪行和劣迹。无疑,“小鸡带老鸡”的做法,也在清算之列。原市委班子领导要要认真反思和反省,我们这几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,也要向群众“讲清楚”,也就是在“三大讲”的政治活动中要“讲清楚”。

记得,当时我们组织部门还外派了工作组进驻,工作组还找我谈了几次话,要我端正态度,正确对待群众意见,认真地将几个问题讲清楚。回忆起来,当时我的态度是可以的,我所知道的事情,基本都一五一十在会上说了,不过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,如当事人的家庭背景,社会关系中的重要问题,我是未说,我没有权利将这些公之于众,也不会说在研究过程中,某某领导怎么交代,某某领导怎么表态。我只是从盲目从某方面检查自己,从驯服论方面深挖自己。我的原则是不伤人,不害人,只讲自己,不涉他人。可是,讲了几次,都未“过关”,我有点不耐烦了,怨气开始冒头了。尤其是知道只有那么少数一、二个人,出于个人私怨,当面不说,背后捣鬼,会上不说,会下乱讲,我更有气,认为这不是关心人,帮助别人,而是作难人,泄私愤。我执意不再“讲”了,坦率地向派驻的工作组同志说:“我没有什么再讲的了,如果认为我还有什么问题,可以审查,我接受组织的审查”。未成想,从这以后,就没有再找我了,也没有让我再“讲”了。没多久,“三大讲”活动也就结束了,工作组的同志也都撤了,机关一切开始恢复正常,特别是从当时的滁州地区调来邓子文同志任组织部长后,更是一切趋于正常了。随之,我仍然干我的干部人事工作。

回首往事,真是有点幼稚可笑。在那种极“左”思潮泛滥的年代,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路线之下,一个人的命运,特别是在政界生存的人,不知哪天会大祸临头,是祸是福,是红是黑,排定不了。也就是说,每个人都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。就如同大自然的雨——谁也是未知,更是难主。就是说,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,一切只有听天由命,唯一的信念和宽慰,只有凭良心用“问心无愧”来取舍自己的行为。

拟宋马麟笔意(国画) 耿广春



皖长江长廊

袁鹤群

陈独秀的《小学识字课本》

陈独秀晚年投入精力最多的是撰写《小学识字课本》。1939年至1942年,他写给台静农的一百余封书信,百分之七十都是关于他正撰写的这部著作。或增补字条删修书稿,或忧虑寄出的书稿是否已抄正及校改,更担心手稿和抄正书稿遗失或毁于战火,催问何日能出版及如何出版等等。1940年6月15日,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写道:“此次续写之稿,约为期月余,甚勉强,致于左边耳聩之外,又加以右边脑子时作阵痛,写信较长,都不能耐,势必休息若干时日也。”

《小学识字课本》只完成了上十章,诠释了545个字根、半字根汉字,包括像数7字,像天宇、像地32字,像草木57字,像鸟兽犬虫鱼82字,像人身体63字,像人动作67字,像官室城郭40字,像服饰25字,像器用157字。上篇完成后,抱病继续写下篇。字根孳乳之后,包括字根合并的繁体字63字,合体字243字,象声字158字,以及字根并合附

加偏旁旁的字。1942年5月13日上午,正写到《合体字》一章的“抛”字时,猝然病倒,就此搁笔。陈独秀在病痛和窘迫的环境中写这部书,又忧心书稿遗失或不能出版,后来的命运果如何他所料。这部书当时未能出版,原因固然多种,主要是因为教育部长陈立夫从中作梗。结果只意见50份分送学者和文化机关,征求意见,而陈独秀本人连油印稿未看就病故了。

陈独秀晚年的这部书稿之修改、誉正、油印、台静农出力最多。再一位是魏建功,如陈独秀在1940年11月30日信中说:“拙稿经建功兄校正,有所修改或加注,为益实多。”为油印稿刻蜡纸者姓何。

陈独秀对自己这部著作是颇自信的,认为必能传世。他在1940年12月30日信中写道:“仍望由馆中油印二三百份,分散各省,以免川乱将原稿散失。拙稿虽未臻完善,而弟颇自矜贵也。”

陈独秀心血结晶的这部未能最后完成的遗著,由梁实秋带去台湾一本油印稿,七十年代初在台湾影印出版,书名改为《文字新论》,没有著作人,删掉了陈独秀的《自叙》,代以梁实秋一序。梁实秋促成此书最先正式出版,功不可没。

陈独秀挚友王星拱得《小学识字课本》油印稿一本,一直珍藏着。1946年,他任中山大学校长时,曾借给在该校教训训学的严学窘一阅,严先生将二十万字书稿抄存一份。后经严先生努力,书稿由刘志成整理修订,由成都知名书法家张勉之工楷誉正,1995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,精装,十六开本,300多页。

至于陈独秀的《小学识字课本》这部著作的价值,正如学者刘志成先生认为的那样:“以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辩证析汉字字根,研究汉语同源词,那应当首推风云学者陈独秀。这也是前代任何研究汉语同源词的学者不可能做到的。”

老屋

东流纪事

打开记忆的阀门,依稀记得老东流的一些人文历史、风土人情,它的亲和力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,它的故事是构成我思乡的纲。

香隅和牛头山先后出土的6000—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和商代文物;舜耕历山的历史传说;一代一代口碑流传的东流民谣民谣;特产张溪麦鱼;东流杠子糖;江心洲回水湾的鲤鱼,是水中的“大熊猫”;扬名新中国的东流水牛……

古老的护城河又名学湖俗称南门湖;随滔滔江水不断移动的东流江心沙洲;升金湖湿地乃鸟类的天堂;七里湖、狭阳湖、北门湖和前述数湖环抱东流,构成了江南水乡美景,天生一个鱼米之乡;东流老街和它那留在老街麻石条上的独轮车车辙、那些浅埋在街道菜园黑土地里的碎瓷片、古砖块、老屋基石墩、井栏以及锈蚀的铜铁链,别小瞧了,它们是千百年来人类堆积的历史文化层……

东流的记忆中还有宋代的一地两县府(东流城的东流县府、香口河畔的望江县府);黄菊乡与菊江书院;古城墙和它的五座城门;城内城关东门口和西门城外;马马里和十字街;1200平方米的高家大屋;城外桥头

安家大屋;三层三进的(慕周)家圆门官厅大屋,建国后一度作为东流县委办公室(1949—1954)……

东流县城关男女教堂及泉水塘总教堂——《皖政辑要》有记:“东流县(教堂)八所:城东北岭上,华式瓦屋二重,同治十三年价买邹、余二姓之屋;城东街华式瓦屋一重,光绪十五年价买姓之屋……美圣公会堂在城内码头街,华式瓦屋一重,光绪三十二年价租高姓之屋,教士李声,美(国)人”(注:文中所称东流县“城东北岭上邹姓屋”,系我母亲祖屋的一部分,另一部分祖屋先前被日军侵占后借给我军独立营陈万福的部队驻扎),这一组明清时代的东门岭派建筑,在1956年前后,被有偿征用为东流县兵役局和县医院、血防站等单位的建设用地……

古迹还有历山法藏寺(明代尧舜祠、草龙庵);南门湖畔觉心庵;北街明代炎帝庙;陶公祠和双塔;县衙;城隍庙与红庙;嵌在安庆古城墙上的东流“黄石矾”(字样)古城砖;南京中山陵出现的东流城砖;朱元璋修筑明代凤阳中都城有东流贡砖;现存老东流县的大渡口大公馆碑刻,是东流通往省城安庆的官方驿站

的历史记录……

今东至县中医院洋湖分院就是原东流县中医院,1970年代作为备战医院迁入;今天的马鞍山黄梅戏剧团前身是由东流县黄梅戏剧团迁入;建国前桐城天柱中学迁东流,时任校长龙笑云,天柱中学前身为后来东流中学的一部分;当代安徽省高考状元金鑫,祖籍东流,因其母金来娣与笔者同窗,故略记一笔;同样,当代另一位状元——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得者何斯迈,他的祖籍也是东流,其外公赵五林与笔者街坊,作为老东流人,算是跟着沾了两回“状元光”……东流,说不尽的文献史迹、地方掌故、逸闻趣事、民间野史,直到1958—1959年拆县并县,直到今天。

